

拉薩爾：第一部《聖經》中文全譯本的合作譯者

譚樹林

[摘要] 拉薩爾是出生並成長於澳門的亞美尼亞人，因通曉中文，被澳葡政府僱用，負責處理與北京之間的官方通信。遣往加爾各答後，先是受聘於威廉堡學院，從事聖經漢譯及中文教學，後成為馬士曼的中文老師。他與馬士曼合作，歷時 15 年將《聖經》全部譯為中文，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聖經》中文全譯本，它不僅在南洋華人信徒中廣泛流傳，對浸信會一派的聖經漢譯產生了重要影響，拉薩爾亦藉此成為中文《聖經》翻譯史上無法繞開的人物。

[關鍵詞] 拉薩爾 馬士曼 聖經翻譯

《聖經》漢譯始自唐代景教傳入，迄今已有 1300 多年歷史。由於各種原因，《聖經》中文全譯本的翻譯及出版，直到 19 世紀初才得以完成。過去人們一度認為，世界上首位將《聖經》全文漢譯並予以出版的人是英國倫敦傳教會（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 — 1834）。然而事實是，第一位將《聖經》全文譯為中文並予以出版的人是英國浸信傳教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派往印度的傳教士馬士曼（也譯作“馬殊曼”，Joshua Marshman，1768 — 1837，圖 1）。正如“馬禮遜譯本”是由馬禮遜和同工米憐（William Milne，1785 — 1822）合譯一樣，馬士曼翻譯《聖經》時也有一個重要的合作者，此人便是在澳門出生的亞美尼亞人拉薩爾（亞美尼亞語：Hovhannes Ghazarian；英語：Joannes/Johannes Lassar）。^①

作者簡介：譚樹林，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學博士。南京 210046

^① Joannes Lassar 無中文姓名，除“拉薩爾”外，還有“拉撒”、“拉沙”、“沙拉”和“拉薩”等譯寫。“拉撒”見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 年，頁 39；林煌天編：《中國翻譯詞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頁 596；（德）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著，蔡錦圖譯：《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2 年，頁 34；唐子明：《啟示與文字：中文聖經翻譯的故事（1807 — 1919）》，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18 年，頁 13。“拉沙”見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頁 178；卓新平編：《宗教理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年，頁 440；張西平、孫健主編：《中國古代文化在世界：以 20 世紀為中心》，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 年，頁 196；“沙拉”見林楚平：《在花毯背面》，鄭州：大象出版社，2000 年，頁 95；“拉薩”見趙曉陽：《傳教士與中國國學的翻譯——以《四書》《五經》為中心》，鞠曦主編：《恒道》第 2 輯，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頁 489。

圖 1 馬士曼 (Joshua Marshman)



圖片來源：顧鈞：〈漢學奇人馬士曼〉，https://www.sohu.com/a/446344141_120244154。

亞美尼亞人 (Armenians) 是原居住在南高加索地區的古老民族，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將東正教作為國教的民族。自 11 世紀起，亞美尼亞王國因遭受不同異族政權的瓜分而解體。失去家園的亞美尼亞人被迫流散到世界各地，形成“貿易離散群體”。^① 截至 17 世紀，亞美尼亞商人已在印度各地營建了一個連接東南亞各港埠的龐大貿易網絡，“亞美尼亞人散佈在亞洲各地，只要有貿易機會，他們就在那裡建立定居點”。^② 據學者研究，16 世紀中期，馬德拉斯 (Madras) 境內已形成 Chinipatane 亞美尼亞人的聚居區。根據在 Sourb Tovma 教堂發現的一份亞美尼亞人與葡萄牙人簽訂的協議，“從 1549 年到 1557 年間，經中國人同意，又在澳門定居。毫無疑問，緊跟着葡萄牙人而來的是亞美尼亞人”。^③ 若此說不誤，可知在澳門開埠之初，亞美尼亞人已踏足澳門。1688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和新朱爾法 (New Julfa) 的亞美尼亞人達成協議，承諾給予亞美尼亞人在馬德拉斯貿易的優惠。^④ 同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又向加爾各答的亞美尼亞商人頒發特許狀，允許他們享有“歐洲商人享有的一切特權”。^⑤ “這類特權使亞美尼亞商人在中

-
- ① (美) 菲利浦·D·柯丁 (Philip D. Curtin) 著，鮑晨譯：《世界歷史上的跨文化貿易》，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 年，頁 2。
- ② *Reports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with Extracts of Correspondence (etc.) Volume the Third, For the Years 1814 and 1815.* J. Tilling, Grosvenor-row, Chelsea, 1815, p. 349.
- ③ (法) 讓·皮埃爾·馬艾 (Jean-Pierre Mahé)：〈亞美尼亞人和中國〉，《復旦學報 (社會科學版)》(上海)，第 3 期 (2014)，頁 42 - 43。
- ④ 卓效梅、張靜雪：〈17 世紀波斯亞美尼亞人跨區域貿易網絡的形成、發展與地位〉，《西亞非洲》(北京)，第 1 期 (2023)，頁 69。
- ⑤ Morse, Hosea Ballou.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1,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p. 174.

國站穩了腳跟”，^①活躍於澳門—馬尼拉—印度航線，亞美尼亞商人趁機進入澳門。澳葡政府之所以允許亞美尼亞商人進入澳門，除葡萄牙人早期即與亞美尼亞人建立的密切關係外，還有三點極為重要：一是亞美尼亞人的商業貿易能力，可以給澳葡政府帶來豐厚利潤；二是宗教信仰相同，許多亞美尼亞商人為獲得貿易特權而“皈依”天主教，與澳葡政府的羅馬天主教傳統相同；三是亞美尼亞商人居無定國，他們“因國土被土耳其、俄國和波斯分割而流離顛沛”被澳門伸開雙臂歡迎。^②據學者研究，“亞美尼亞人在澳門的永久聚落至少在18世紀中葉就開始出現，到19世紀之前，這些亞美尼亞人在澳門的聚落已經牢牢地紮根”。^③拉薩爾家族因從事貿易而來到澳門。

目前確知，拉薩爾家族定居澳門最早始於拉薩爾的伯父馬休斯·約翰尼斯（Matheus Johannes，也譯作“馬瑟斯”），他於1761年首次抵達澳門。馬休斯因多年的成功商業經營而步入上層社會，並於1783年取得葡籍成為葡萄牙臣民。^④他在澳門自由居住，仍然頻繁赴廣州貿易。1794年，馬休斯·約翰尼斯在廣州去世，^⑤他的兄弟——也就是拉薩爾的父親——拉扎羅·約翰尼斯（Lazaro Joannes）接管了他的船隻和貿易。^⑥

拉扎羅·約翰尼斯到達澳門的時間，有兩種記載：一份資料稱在1780—1781年左右，他曾與妻子到過澳門；^⑦另一份資料顯示，拉扎羅·約翰尼斯到澳門則要更早一些。據史料記載，1777年，一位名叫若昂·費爾南德斯（João Fernandes）的澳門葡人去世，他倉庫裡的貨物清單上，記載有11箱屬於拉扎羅·約翰尼斯的鴉片。^⑧這說明1777年之前，拉扎羅·約翰尼斯已在澳門進行鴉片貿易。據史料記載，拉扎羅·約翰尼斯夫妻“到達澳門不久就生下一子，名叫約翰尼斯·拉扎羅（Joannes Lazaro）”，^⑨此子應該是拉薩

①（英）施其樂（Carl T. Smith）、（美）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郭頤頓譯：〈追尋澳門亞美尼亞商人的足跡〉，《文化雜誌》（澳門），總第55期（2005），頁87。

②（葡）潘日明（Benjamin Videira Pires）著，蘇勤譯：《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頁137。

③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上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705。

④（英）施其樂（Carl T. Smith）、（美）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尚春雁譯：〈四個亞美尼亞家庭〉，《文化雜誌》（澳門），總第56期（2005），頁44。

⑤關於馬休斯·約翰尼斯（Matheus Johannes）去世的具體日期，施其樂（Carl T. Smith）、范岱克（Paul A. Van Dyke）文中出現1794年10月10日和1794年12月10日兩個不同的日期，見（英）施其樂（Carl T. Smith）、（美）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尚春雁譯：〈四個亞美尼亞家庭〉，《文化雜誌》（澳門），總第56期（2005），頁44、46。但據作者注釋（24）所引各種檔案資料判斷，馬休斯·約翰尼斯（Matheus Johannes）去世的具體日期應為1794年12月10日。

⑥（美）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徐素琴譯：《廣州貿易中的模糊面孔：摩爾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巴斯人、猶太人和東南亞人》，李慶新主編：《海洋史研究》第10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頁442。

⑦澳門檔案館：3.VIII. no.2(1967年8月)81-82，轉引自（英）施其樂（Carl T. Smith）、（美）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尚春雁譯：〈四個亞美尼亞家庭〉，《文化雜誌》（澳門），總第56期（2005），頁47。

⑧澳門檔案館：3.VIII. no.2(1967年8月)81-82，轉引自（英）施其樂（Carl T. Smith）、（美）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尚春雁譯：〈四個亞美尼亞家庭〉，《文化雜誌》（澳門），總第56期（2005），頁47。

⑨（英）施其樂（Carl T. Smith）、（美）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尚春雁譯：〈四個亞美尼亞家庭〉，《文化雜誌》（澳門），總第56期（2005），頁48。

爾 (Johannes Lassar)。許多學者認為拉薩爾出生於 1781 年，^① 因此 1780 年應該是拉扎羅·約翰尼斯定居澳門的年份，而非他首次造訪澳門的時間。

拉薩爾出生於一個富裕的家庭，他從幼年起就學習漢語口語。關於他學習中文的情形，有兩種記載，一是來自美國傳教士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 – 1861) 的說法：拉扎羅·約翰尼斯家中僱用一男一女兩位中國基督教徒為僕人，拉薩爾最初跟這兩位僕人學習漢語。後來，其父從廣州請來一位中文老師，教他讀寫官話。^② 另一種記載來自拉薩爾本人：他自幼年就學會漢語口語，由於對這門語言有特殊的愛好，所以渴望更全面的瞭解，他的父親傾向滿足他的這一願望。在他最適合提高語言能力的年紀，父親將他送到廣州，^③ 並聘請了兩位老師來教他，分別教中文 (Chinese)^④ 和官話 (Mandarine)。前者每月佣金 30 洋元 (dollars)，後者每月 35 洋元。^⑤ 第一位老師頗有學問，但採取的教學方法是強制他記住大量漢字，並讓他揣摩其含義。第二位老師則完全不同，他本人熱衷於學習，很樂意把知識傳授給熱切的學生。拉薩爾記住了大量漢字，希望能取得快速進步。在官話老師的教導下，拉薩爾夜以繼日地學習，閱讀了近 40 卷中文書籍。此後，拉薩爾可以借助中文字典獨自學習。^⑥ 幾年後，拉薩爾的官話口語及書面語均達到相當水平，他也因此被澳葡政府聘用，負責翻譯、處理與北京宮廷之間的官方信件。^⑦ 對此，馬士曼評論道：“這給了他一個更加沉迷於中文閱讀的機會，

① (德) 尤思德 (Jost Oliver Zetzsche) 著，蔡錦圖譯：《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2 年，頁 34；(英) 施其樂 (Carl T. Smith)、(美) 范岱克 (Paul A. Van Dyke) 著，尚春雁譯：〈四個亞美尼亞家庭〉，《文化雜誌》(澳門)，總第 56 期 (2005)，頁 48；Gupta, Abhijit. “A Note on Chinese Printing in Serampore.” *New Word Order: Translational Themes in Book History*, edited by Swapan Chakravorty, Abhijit Gupta, Worldview Publications, 2011, p. 160. 也有學者主張拉薩爾出生於 1778 年，如 Poladian, Derenik. *The Armenian Merchants of China and Hovhannes Ghazarian*. Amsagir Kronakan, Grakan, Banasirakan, 1959, p. 276. 可惜的是，作者沒有提供任何證據。李爽學稱其 1741 年出生，應誤，見李爽學：〈晚明翻譯與清末文學新知的建構——有關《譯述：明末天主教翻譯文學論》的一些補充〉，《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台北)，第 21 卷第 1 期 (2011)，頁 206。

② Bridgman, Elijah Coleman.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no. 6, Oct 1835, p. 252.

③ “Some Account of Mr. Lassar in a Letter from Mr. Marshman to Dr. Ryland, when He Had Been with Him Nearly a Year.” *Periodical Accounts Relative to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vol. III, no. XVIII (1807-1808),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808, p. 461. 拉薩爾這裏沒有提到他的具體年齡，但 Derenik Poladian 說是 10 歲，Poladian, Derenik. *The Armenian Merchants of China and Hovhannes Ghazarian*. Amsagir Kronakan, Grakan, Banasirakan, 1959, p. 276；康太一說是 13 歲，康太一：〈從英譯《論語》到漢譯《聖經》：馬士曼與早期中西對話初探〉，博士論文，北京外國語大學，2013 年，頁 46。

④ 根據當時廣州一般私塾對學生課業的要求，拉薩爾所學的“中文”，應該是以粵語音朗讀《三字經》、《千字文》等啟蒙書籍或者經書，並背記漢字的形音義為主。

⑤ “Some Account of Mr. Lassar in a Letter from Mr. Marshman to Dr. Ryland, when He Had Been with Him Nearly a Year.” *Periodical Accounts Relative to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vol. III, no. XVIII (1807-1808),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808, p. 462. 這裏的貨幣單位“洋元” (dollar)，既非墨西哥鷹洋 (1823 年開始鑄造)，亦非澳門幣 (1905 年 9 月 4 日始葡萄牙政府授權大西洋銀行在澳門發行澳門元鈔票)。由於當時使用的貨幣極為複雜，“洋元”具體為何種貨幣，目前只能存疑。

⑥ “Some Account of Mr. Lassar in a Letter from Mr. Marshman to Dr. Ryland, when He Had Been with Him Nearly a Year.” *Periodical Accounts Relative to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vol. III, no. XVIII (1807-1808),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808, p. 462.

⑦ Buchanan, Claudius. *The Works of the Rev. Claudius Buchanan, LL. D. Comprising His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Whiting & Watson, 1812, p. 20; 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7, p. 51.

我有理由相信他利用了這個機會，因為他似乎比我認識的大多數人更喜歡中文書。”^①

然而，拉薩爾的這份工作並沒有持續太久。大約在 23 歲時，他將注意力轉向商業領域，因為在這方面，他的很多同胞大獲成功，其父即因經商致富。1802 年，拉扎羅·約翰尼斯因不滿澳葡政府指責其將資金轉到澳門以外的亞美尼亞帳戶，攜全家離開澳門，遷往加爾各答。^② 這為拉薩爾從事聖經翻譯提供了契機。

英國浸信會在印度的傳教始於被稱為“近代宣教之父”的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 1761 – 1834, 圖 2）。^③ 1791 年，他的《基督徒當竭盡所能引領異教人民歸正》（*An 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s*）被讚譽為“現代傳教事業的憲章”。^④ 1792 年 10 月，他發起成立近代第一個傳教士差會——浸信會異域傳播福音差會（Baptist Society for Propagating the Gospel Among the Heathen）。他於 1793 年 11 月 11 日抵達加爾各答，成為首位被派赴印度的傳教士。在加爾各答，他一邊研讀語言、翻譯聖經，也不斷講道。由於英國東印度公司並不歡迎傳教士，1799 年，威廉·克里被迫遷移到加爾各答附近的丹麥殖民地塞蘭坡（Serampore）。同年 10 月 9 日，馬士曼和威廉·沃德（William Ward, 1769 – 1823）等人抵達加爾各答，因同樣原因無法上岸，他們被迫於 13 日轉往塞蘭坡。^⑤ 由此，三人組成“塞蘭坡三傑”（Serampore Trio），^⑥ 在那裏建立佈道站，創立印刷所，從事多種語言翻譯及出版《聖經》，兼傳教及設立學校。

① “Some Account of Mr. Lassar in a Letter from Mr. Marshman to Dr. Ryland, when He Had Been with Him Nearly a Year.” *Periodical Accounts Relative to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vol. III, no. XVIII (1807-1808),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808, p. 462.

② （英）施其樂（Carl T. Smith）、（美）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尚春雁譯：〈四個亞美尼亞家庭〉，《文化雜誌》（澳門），總第 56 期（2005），頁 48；*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no. 6, Oct 1835, p. 252. 美國學者卡茨（Elmer H. Cutts）認為，拉薩爾去加爾各答是在 1804 年，見 Cutts, Elmer H. “Chinese Studies in Beng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62, no. 3, Sep 1942, p. 173, footnote 15. 英國學者斯蒂芬·尼爾（Stephen Neill）說拉薩爾是在 24 歲時到達加爾各答，意即拉薩爾是 1804 年抵加爾各答，見 Neill, Stephen.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India: 1707-185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96.

③ 苗柏斯（Basil Miller）著，徐成德譯：《克里威廉——近代宣教之父》，香港：大使命基督徒團契，1995 年。

④ Carey, William. *An 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s*. Ann Ireland, 1792.

⑤ Marshman, John Clark. *The Life and Times of Carey, Marshman, and Ward. Emb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 Vol. 1,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1859, p. 111.

⑥ Laird, M. A.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aries to Education in Bengal, 1793-1837.”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31, no. 1, 1968, p. 92.

圖 2 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



圖片來源：<https://zh.m.wikipedia.org/wiki>。

當時除塞蘭坡佈道站外，英國政府在加爾各答創辦的威廉堡學院（也譯作“英印學院”，College of Fort William）也對翻譯聖經極為重視。該學院專設一部門，負責將聖經翻譯成東方語言。^① 該學院成立於 1800 年 5 月 4 日，^② 旨在幫助年輕英國官員熟習當地語言及文化，學院為此開設多種印度語言教學與翻譯。該學院重視聖經翻譯，可能與學院教務長——英國國教會布朗牧師 (Rev. David Brown, 1763 – 1812) 與副教務長布坎南牧師 (Rev. Claudius Buchanan, 1766 – 1815, 圖 3) 熱衷差傳有關。布坎南牧師認為不僅要將聖經翻譯為各種印度語言，更重視將聖經譯為中文：

關於基督教傳播的討論中，一些信仰者把眼光完全局限於印度，據推測，原因是印度與英國的政治關係。然而，尋求神的啟示的國家中印度只佔一小部分。與印度相比，馬來亞群島較之印度擁有更多的領土和人口。中國比這兩者都更廣闊；在某些方面，遠比它們更重要。羅馬教會與那個帝國保持着長期而無效的鬥爭，因為它永遠不會給人們‘美好而完備的恩賜’——《聖經》。……獲得中文聖經版本是威廉堡學院主管者的夙願。一個很重要的目標看來是尋覓一位博學教授來從事這項工作。只要有一部中文聖經傳入中國，那麼這個龐大帝國的幾乎每個角落都可以抄錄。^③

除傳播福音外，“另一個可見的目標是向我們的人介紹一些漢語知識；儘管西藏邊境的

^① Buchanan, Claudius. *The Works of the Rev. Claudius Buchanan, LL. D. Comprising His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 Whiting & Watson, 1812, p. 13.

^② Buchanan, Claudius. *The Works of the Rev. Claudius Buchanan, LL. D. Comprising His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 Whiting & Watson, 1812, p. 14.

^③ Buchanan, Claudius.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With Notices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Oriental Languages*. Ninth Edition, London: G. Sidney, 1812, pp. 9-10.

中國要塞俯瞰孟加拉境內的公司領地，但據說在印度服務的公司中沒人能讀懂一封普通的中文信件”。^①

圖 3 布坎南 (Claudius Buchanan)



圖片來源：Pearson, Hugh.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e Rev. Claudius Buchanan, D. D., Late Vice-provost of the College of Fort William in Bengal*. Third Edition, vol. 1, Strahan and Spottiswoode, 1819.

這裏，布坎南將中文聖經翻譯與宗教傳播以及英國政治、外交事務聯繫到一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當在威廉堡學院擔任孟加拉語和梵語教授的威廉·克里將聖經譯為東方語言的宏偉計劃告知布朗牧師後，得到其大力支持，因為這與威廉堡學院的譯經計劃不謀而合。學院遂決定由威廉·克里主持譯經工作。鑑於威廉·克里希望專注於印度語系的聖經翻譯，中文聖經翻譯便確定由馬士曼負責。

從事中文聖經翻譯，首先要學習中文，在當時的加爾各答找到稱職的中文教師並非易事。為此，布坎南牧師一度準備出資 5,000 盧比 (rupees)，派兩位傳教士從陸路前往中國邊界尋找中文教師，終因該計劃過於冒險被威廉·克里放棄。^② 近乎絕望時，布坎南牧師在加爾各答偶遇拉薩爾。關於拉薩爾當時的境況，有種說法是他正為英國政府

^① Buchanan, Claudius.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With Notices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Oriental Languages*. Ninth Edition, London: G. Sidney, 1812, p. 10.

^② Marshman, John Clark. *The Life and Times of Carey, Marshman, and Ward. Emb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 Vol. 1,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1859, p. 216.

擔任傳譯員。^① 但據布坎南牧師^② 和馬士曼描述，拉薩爾因商業前往加爾各答。他攜帶大批茶葉以備銷售，卻遭遇茶葉價格劇跌而陷入困境。布坎南牧師瞭解到拉薩爾的中文水平後，力勸拉薩爾放棄商務，到威廉堡學院工作，承擔聖經漢譯工作，並教授印度傳教士中文。^③ 馬士曼於 1806 年 8 月 20 日致英國浸信傳教會信中，描述二人相識經過：

不管怎樣這是介紹他給我們的朋友〔布坎南〕的緣故，這個人能夠立即看出和賞識他的才幹，並且具有足以運用它們的廣闊心思。他慷慨地插手協助拉撒先生（即拉薩爾——引者注）脫離困境，得到他的全然信賴，而且聘請他參與他現在進行着的神聖工作，是在我們指導之下的。^④

身陷困境的拉薩爾接受邀請，到威廉堡學院從事聖經漢譯及漢語教學。^⑤ 然而，馬士曼的“指導”並未立即開展，1804 年 9 月拉薩爾漢譯並刊行的《創世紀》和《馬太福音》的部分章節，係其據亞美尼亞語《聖經》（*Armenian Bible*）獨立譯出的。^⑥ 由於宗教知識欠缺等原因，拉薩爾的譯文未獲認可。這使教會上層認識到一作品質上乘的《聖經》中譯本，單靠拉薩爾難以勝任。這樣，已確定負責《聖經》中譯的馬士曼自然成為“指導”。1805 年，布坎南牧師提議馬士曼到加爾各答跟拉薩爾學習中文。但馬士曼在塞蘭坡還要忙於其他傳教事務，加之加爾各答由英國統治，東印度公司對傳教活動亦極不友善，布坎南牧師最終說服拉薩爾遷到塞蘭坡，專心翻譯和中文教學。^⑦ 由於威廉堡學院財政出現困難，拉薩爾最初三年每月 300 盧比的薪水由布坎南牧師自掏腰包資

① Bridgman, Elijah Coleman.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no. 6, Oct 1835, p. 252. 今人彼得·基特森（Peter J. Kitson）、施其樂（Carl T. Smith）和范岱克（Paul A. Van Dyke）亦持此說，分別見 Kitson, Peter J. *Forging Romantic China: Sino-British Cultural Exchange 1760-18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60;（英）施其樂（Carl T. Smith）、（美）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尚春雁譯：〈四個亞美尼亞家庭〉，《文化雜誌》（澳門），總第 56 期（2005），頁 48。

② Pearson, Hugh.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e Rev. Claudius Buchanan, D. D., Late Vice-provost of the College of Fort William in Bengal*. Third Edition, vol. 1, Strahan and Spottiswoode, 1819, p. 320.

③ Hanan, Patrick.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The Writing Proess.” *Treasures of the Yenching: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Exhibition Catalogue*, edited by Patrick Hanan,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003, p. 266.

④（德）尤思德（Just Oliver Zetzsche）著，蔡錦圖譯：《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2 年，頁 35。

⑤ 但是，據美國傳教士裨治文說，拉薩爾到達加爾各答後，即擔任當地英印政府中文翻譯，後受威廉·克里僱用從事聖經翻譯，見 Bridgman, Elijah Coleman.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no. 6, Oct 1835, p. 252.

⑥ 關於刊行時間，約翰·海克斯（John R. Hykes）認為是在 1804 年，見 Hykes, John R.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Her Dependencies: Tabulated to December 31, 1915*. American Bible Society, 1916, p. 2. 詹姆斯·霍夫（James Hough）和喬治·布朗（George Browne）認為是在 1805 年，分別見 Hough, James.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Indi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hristian Era*. Vol. 4, Church Missionary House, 1845, p. 84; Browne, George.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From its Institution in 1804, to the Close of its Jubilee in 1854: Compil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Jubilee Committee*. The Society's House, 1859, p. 193. 康太一認為拉薩爾當時的翻譯並沒有出版，只是以手稿的形式寄給英國聖經公會，見康太一：〈從英譯《論語》到漢譯《聖經》：馬士曼與早期中西對話初探〉，博士論文，北京外國語大學，2013 年，頁 55，注釋 264。

⑦ Buchanan, Claudius. *The Works of the Rev. Claudius Buchanan, LL. D. Comprising His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Whiting & Watson, 1812, p. 10.

助。^①1806年初，馬士曼開始師從拉薩爾學習中文。^②

起初由於沒有以英文或拉丁文解釋的中文字典或詞彙表，拉薩爾不得不採取以中文解釋中文的方式進行教授，導致學習艱難。對此，馬士曼曾言：“拉薩爾先生……的到來，極大地滿足了我一直以來對於漢語的夢想。但我們還是必須克服困難：他沒有關於漢語的字典或詞彙表，無論是英文的還是拉丁文的都沒有。……於是我只好通過書本來學習漢語，其中沒有一個字的外語注釋或翻譯，這樣的學習實在痛苦，有時幾乎動搖了我的決心。但就是用這樣的方法，我最終將《孔子的著作》（*The Works of Confucius*）翻譯出版。”^③由於馬士曼極具語言天賦，^④又勤奮用功，中文水平提高得很快，“當年（1806年）已達翻譯出版《聖經》全譯本和中文語法書的水平”。^⑤當然，此言出自馬士曼長子約翰（John Clark Marshman, 1794 – 1877）之口，難免有誇大之嫌。不過，馬士曼本人亦坦承：

經過受教於他（指拉薩爾——引者注）八個月之後，可以使我能夠說得稍為確切；我在此不得不說，每天與他相處，讓我肯定他具有足以勝任的才能，並且是卓越的中國學者。我不能否認，在我細察他之前，對於他的知識範圍，不是毫無疑惑的；然而，他那不屈不撓的專注力，和他擔任老師時的果斷性格，向他的學生顯示他會盡力堅持取得完美的發音，讓我很快地確信，他是位有過人之才的老師。^⑥

實際上，除拉薩爾悉心教授外，馬士曼中文能力的提高還有三個來源：其一，1809年馬士曼《孔子的著作》（*The Works of Confucius*）第1卷出版三個月後，造訪塞蘭坡的葡

^① Pearson, Hugh.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e Rev. Claudius Buchanan, D. D., Late Vice-provost of the College of Fort William in Bengal*. Third Edition, vol. 1, Strahan and Spottiswoode, 1819, pp. 320-321; Marshman, John Clark. *The Life and Times of Carey, Marshman, and Ward. Emb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 Vol. 1,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1859, p. 244.

^② Marshman, John Clark. *The Life and Times of Carey, Marshman, and Ward. Emb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 Vol. 1,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1859, p. 244. 當時在塞蘭坡成立一個中文班，除馬士曼外，一起跟拉薩爾學習漢語的還有馬士曼的兩個兒子，即13歲的約翰（John Clark Marshman）、8歲的本傑明（Benjamin Wickes Marshman）以及威廉·克里15歲的兒子傑貝茲（Jabez Carey）和一些中國助手。

^③ Marshman, Joshua.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中國言法》）。The Mission Press, 1814, “Preface”, p. ii.

^④ 威廉·克里曾坦承：“馬士曼在四個月內所掌握的語言，我需要八個月的時間。”見〈克里威廉小傳〉，豐盛恩典網站，<http://wellssofarace.com/biography/intro/brief-bio/carey/chapter09.htm>，2020年1月2日讀取。

^⑤ Marshman, John Clark. “The Late Dr. Marshman.” *The Friend of India*, 14 Dec 1837, p. 10.

^⑥ 馬士曼1806年8月20日致浸信傳教會信函，中譯文轉引自（德）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著，蔡錦圖譯：《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2年，頁35–36，注釋112。

萄牙遣使會傳教士劉思永神父 (P. Rodrigues) ^① 給他一部拉漢字典手稿，^② 這極大地便利了馬士曼的漢語學習。在居留塞蘭坡的八個月間，劉思永神父在語法和發音等方面給馬士曼提供了有益幫助。^③ 其二，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 – 1834) 為其僱用的懂官話的中文老師。據馬禮遜 1815 年 7 月 5 日寫於澳門的信件稱，他曾為馬士曼代僱過一位懂官話的中文老師，馬士曼的《中國言法》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較之初稿“大有改善”，即得益於該老師協助。^④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韓南 (Patrick Hanan) 亦提到，來自廣州的一位佚名的中國人曾幫助馬士曼學習中文。^⑤ 此人應該是馬禮遜代僱的那位中文老師。其三，曼寧 (Thomas Manning, 1772 – 1840) 給予的幫助。^⑥ 曼寧是劍橋大學畢業生，1800 – 1803 年曾在巴黎跟意大利漢學家蒙杜奇 (Antonio Montucci, 1762 – 1829) 學習中文，回倫敦後又在一位中國人的幫助下學習漢語，^⑦ 被認為是當時歐洲第一流的漢語學者。^⑧ 曼寧因此被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聘為中文翻譯。1810 年初，曼寧從中國來到加爾各答。據馬士曼自述，曼寧在加爾各答的六個月裏，他經常與曼寧就漢語的本質問題進行討論，加深了其對漢語的理解，尤其是馬士曼先前沒有研究過的漢語聲調，使其受益良多。^⑨

拉薩爾教授中文的同時，也獨自開始《馬太福音》的漢譯。1806 年 9 月 13 日，威廉堡學院教務長布朗牧師造訪塞蘭坡佈道站，拉薩爾將譯好的三份中文聖經樣本送給他。布朗牧師致英國聖經公會的信中提到：“拉薩爾教授給我三份中文樣本，還有一封

- ^① 劉思永神父的全名為 Roderigo/Rodrigo/Rodrigues de Madre de Deus，但其漢名長期不為人所知：張公譯作“羅德理戈”，見 (葡) 阿雷斯塔 (António Aresta)：〈葡萄牙漢學回顧〉，《文化雜誌》(澳門)，總第 32 期 (1997)，頁 9；蘇精譯作“柔瑞國”，見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學生書局，2000 年，頁 86。實際上，清代官方文獻中明確其漢名為“劉思永”，見劉芳輯，章文欽校：《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 年，頁 514 – 518。
- ^② 據馬士曼自言，劉思永神父確將一部拉漢字典的手稿給他，這部字典是在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 1724 年之前編纂的，但馬士曼沒有提及這部字典的具體名字，見 Marshman, Joshua, translator. *The Works of Confucius; Contained the Original Text, with a Translation*. The Mission Press, 1809, p. xxxviii. 馬士曼之子約翰卻提到這字典叫 *Duhalde's Dictionary*，見 Marshman, John Clark. *The Life and Times of Carey, Marshman, and Ward. Emb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 Vol. 1,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1859, p. 244. “Duhalde” 為何人尚難確定，如果是指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 (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 – 1743)，他從未到過中國，遍檢杜赫德的著作目錄，未發現有這樣一部字典。然而，利物浦霍普大學 (Liverpool Hope University) 教授丹尼爾·杰亞拉伊 (Daniel Jeyaraj) 則明確提到拉薩爾用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編纂的《葡漢字典》 (*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 教授馬士曼等學習中文，見 Jeyaraj, Daniel. “Embodying Memories: Early Bible Translations in Tranquebar and Serampore.”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 Research*, vol. 40, no. 1, 2016, p. 53. 遺憾的是，他並沒有提供論據出處。因此，關於這部字典的真實情況，尚有待進一步考證。
- ^③ Marshman, Joshua.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中國言法》), The Mission Press, 1814, “Preface”, pp. ii-iii.
- ^④ “Morrison to Unidentified Person, Macao, 5 July 1815”，轉引自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學生書局，2000 年，頁 141。
- ^⑤ Hanan, Patrick. “The Bible as Chinese Literature: Medhurst, Wang Tao and the Delegates’ Vers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3, no. 1, 2003, p. 198.
- ^⑥ 清代官方文獻稱“萬寧”，見《清代外交史料》下，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年，頁 523。
- ^⑦ (英) 克萊門茨·R·馬克姆 (Clements Robert Markham) 編著，張皓等譯，石碩等校：《叩響雪域高原的門扉：喬治·波格爾西藏見聞及湯姆斯·曼寧拉薩之行紀實》，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年，頁 137。
- ^⑧ Stifler, Susan Reed. “The Language Studen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Canton Factory.”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69, 1938, p. 74.
- ^⑨ Marshman, Joshua.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中國言法》), The Mission Press, 1814, “Preface”, p. iii.

中文信，這是他勞心勞力的成果。這些樣本是今天上午倉促準備的，我建議不必苛評。但是拉薩爾對中文瞭若指掌，如果上帝讓他多活五六年，他將完成聖經漢譯的偉大工作。他閱讀中文如同你讀英語一樣容易，寫得也一樣快。”^①可見，布朗牧師很讚賞拉薩爾的中文水平。^②到1807年，拉薩爾將《馬太福音》譯為中文，題名《嘉音遵囑吡菩薩之語》（圖4），此為最早的單卷聖經漢譯本。拉薩爾以毛筆書寫的手抄本，被交到布坎南牧師手中，布坎南牧師在手寫本上留下贈寄詞後，將此手寫本贈送給英格蘭坎特伯利大主教，藏於主教官邸內的蘭伯斯圖書館（Lambeth Library）。^③1808年，《嘉音遵囑吡菩薩之語》刊行出版，^④“從那時起，《新約》的相當一部分是按照中國的方式用木版印刷出來”。^⑤

^① *The Third Report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Stanhope & Tilling, 1807, p.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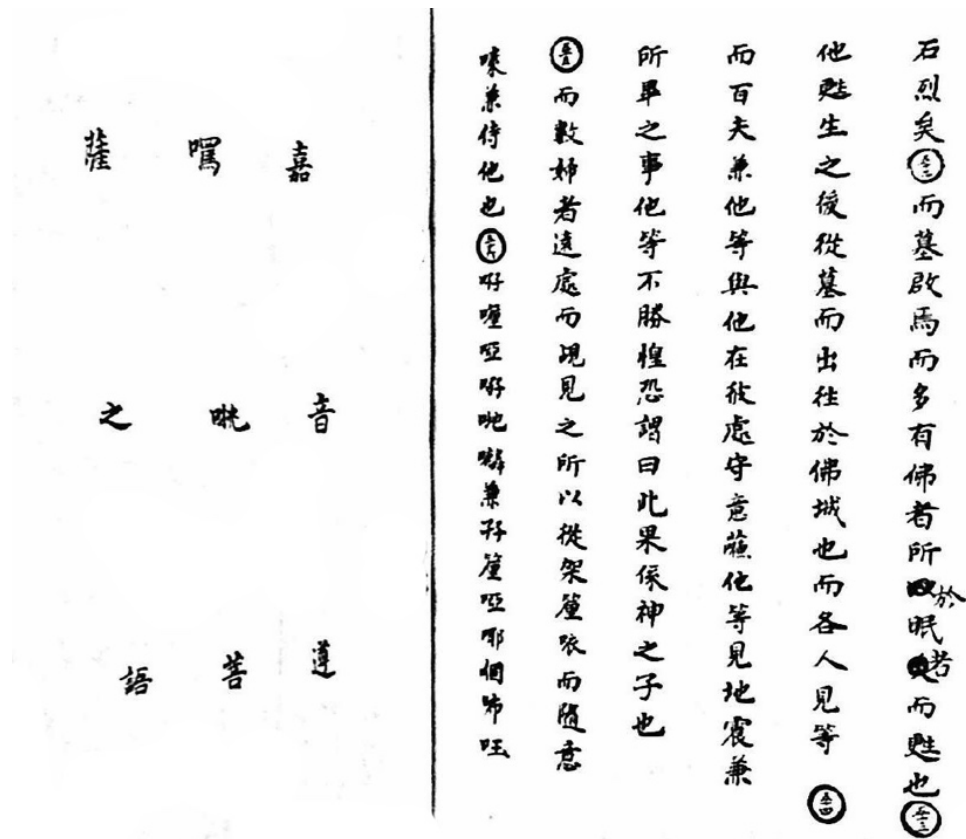
^② 但馬禮遜對拉薩爾的中文能力和聖經知識表示懷疑：“我擔心我們在印度的弟兄被一個叫拉薩爾的亞美尼亞人所騙。我們有理由相信此人中文根底非常淺薄，對聖經的知識更加不堪……”見 Morrison, Eliza A. Compil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D. D., F. R. S., M. R. A. S., Member of the Society Asiatique of Paris, &c. &c.*,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Longmans, 1839, vol. 1, p. 169. 後人對拉薩爾語言水平的詬病，或許源於此。

^③ Buchanan, Claudius.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With Notices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Oriental Languages*. Ninth Edition, London: G. Sidney, 1812, p. 11. 關於這個譯本的特色，請參唐子明：《啟示與文字：中文聖經翻譯的故事（1807—1919）》，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18年，頁20—24。日本學者永井崇弘撰文探討了該譯本中的“首見漢字”，見（日）永井崇弘：〈關於1807年拉沙漢譯的《嘉音遵囑吡菩薩之語》中的首見漢字〉，《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吹田），總第42卷（2021），頁47—66。

^④ （日）永井崇弘：〈關於1807年拉沙漢譯的《嘉音遵囑吡菩薩之語》中的首見漢字〉，《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吹田），總第42卷（2021），頁48。

^⑤ Buchanan, Claudius. *Christian Researches in Asia: With Notices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Oriental Languages*. Ninth Edition, London: G. Sidney, 1812, p. 11.

圖 4 1807 年拉撒翻譯《嘉音遵囑咄菩薩之語》（《馬太福音》）



圖片來源：唐子明：《啟示與文字：中文聖經翻譯的故事（1807－1919）》，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18年，頁18。

拉薩爾有此譯經經歷，加之馬士曼中文能力的提高，1807年或1808年中旬，^①馬士曼開始與拉薩爾合譯聖經。遵從傳統的譯經慣例，他們也從《新約》譯起。關於譯經過程，1813年12月，馬士曼致浸信傳教會秘書瑞蘭德博士（Dr. John Ryland, 1753－1825）的信中有詳細說明：

正如我已經告訴你的，翻譯的第一步，是由拉薩爾先生坐在我的肘旁（他經年累月地坐在那裏），並且由英文翻譯過來，輔以他的亞美尼亞語知識。在他開始處理所分配的部分之前，他先會和我一起閱讀，直至他覺得不再必需，這要花費有很長的時間；所以他現在只是與我商量某些特別的用字和片語。在充分的時間中逐節處理校正；我手持格利斯巴赫（Griesbach）^②版本原文，仔細閱讀每節中文的經文，對於某些用字的意思提出我的疑問，作出取捨。這樣

^① Wylie, Alexander. *Chinese Researches*. K. Paul, Trench & Company, 1897, p. 97.

^② Griesbach 全名為 Johann Jakob Griesbach，即約翰·雅各布·格利斯巴赫，德國聖經文學批評家，其《新約》批判版共3卷，1774年至1775年在哈勒發行首版，其後經其他學者修訂，又出版了第二版和第三版。

完成一章經文，有時要三至四小時，我把中文交給他，然後用英文慢慢地清楚念出格利斯巴赫版本的經文，他就仔細校閱中文的譯文。跟着抄寫下來，有時（當仍然有疑問時）要第二次校閱，甚至是第三次。然後就送去付印，再作一次新的審察。當一頁的雙面用鉛版的活字排滿後，我和另一名不懂英文的中國助手同讀一遍。他會建議某些改動，好讓文筆更加清晰。改正之後，再印幾份清樣，有需要的話，再多兩三個人閱讀。完了之後，我就獨自坐下來，閱讀一遍，再次與格利斯巴赫版本對照，有時也與別的人商討。對我來說，這是最徹底的審閱了。我在這裏有兩部拉丁文與中文字典，任何我感到意思不明之處，利用它們逐一查考；為了更奏效，我拿了一本簿冊，寫下每一個所查考的詞的意思。正如我所告訴你的，這些字詞甚少多過 20 個，有時還沒有這麼多。在閱讀格利斯巴赫版本的原文時，我稍微有別於起初用的方法。以前我是逐段讀，現在是先讀一小段原文，也許一次讀五六行，然後再讀那小段的中文，這樣我可以從中獲益：我發現這是有益的。我在頁邊空白處寫下想法及看似有出入的地方，然後與拉薩爾先生和中國助手坐下來協商，直到問題得以解決，差異之處得以調整。這步完成後，我又把清樣交給我的兒子約翰審閱，因為他對漢文語辭的學識比我還多。當他對這份清樣覺得滿意後，又印了另一次清樣，一份給中國助手，另一份給拉薩爾先生，讓他們各自閱讀，分別指出他們認為不妥之處。之後，我將譯文與格利斯巴赫原文作最後一次比較，查考是否有我們都未注意到的遺漏之處。然後，我另將一份清樣交給中國助手，要求他根據中文的意思加以句讀，我再對此進行覆核；如果我倆的看法一致，就送到印刷所。出版之前，印刷所又送來一次清樣，我先交給中國助手，檢查其中是否有錯誤，然後交給拉薩爾先生過目，再由我審閱後，這才安排印刷。^①

這段敘述儘管有些冗繁，但筆者不忍刪捨，因為它真實記錄了馬士曼譯經的嚴肅和認真。我們藉此也看到拉薩爾在譯經過程中的作用，惟其如此，一向對傳教懷有敵意的英印總督明托（Gilbert Elliot-Murray-Kynynmound, 1st Earl of Minto, 1751 — 1814）在 1808 年威廉堡學院年度演講中，亦對拉薩爾的譯經工作給予特別表揚：

我必須讚揚拉薩爾先生以及相關的博學虔誠之人的熱情和堅持不懈的工作，為造福未來，我們希望在這一廣闊而人口稠密的地區，完成《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中文版本，向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打開宗教和道德財富的寶藏。^②

^① Marshman, Joshua. *A Memoir of the Serampore Translations for 1813: To Which is Added, An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Dr. Marshman to Dr. Ryland, Concerning the Chinese*. J. G. Fuller, 1815, pp. 33-35. 中譯文亦參考蔡錦圖：〈浸宣足跡：早期浸信會對華人的事工〉，《香港浸信會差會》（香港），總第 94 期（2018），頁 10。

^② Pearson, Hugh.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e Rev. Claudius Buchanan, D. D., Late Vice-provost of the College of Fort William in Bengal*. Vol. 2,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author, Oxford, 1817, p. 199.

儘管經過上述的種種程序，譯文的品質仍難令人滿意。1810年^①譯畢並試刊行的《此嘉語由呀咻所著》（《馬太福音》）、1811年完成刊行的《此嘉音由呀嘞所著》（《馬可福音》）^②中，用“嘉語”、“嘉音”代指“福音”，將 Matthew 音譯為“呀咻”，Mark 音譯為“呀嘞”，以及許多人名、地名、神名的翻譯亦不得生搬硬造，“以致譯文佶屈聱牙，晦澀難懂”。^③這種情況，與譯者遠在塞蘭坡、沒有任何《聖經》中譯本可資參照有很大關係。1811年《此嘉音由呀嘞所著》刊行後，馬士曼收到馬禮遜從廣州寄來的《四史攸編耶穌基利斯督福音之會編》抄本，^④意識到自己譯本的瑕疵，遂決定參照此抄本，對《新約》譯本進行重譯。所以，1813年刊印的《若翰所書之福音》（《約翰福音》），與之前譯本相比品質大為提高。當代學者馬敏即注意到：《若翰所書之福音》“突然有了質的飛躍，不僅文筆變得通順流暢，而且譯名也多半與以後通用的漢譯名一致起來”。^⑤馬禮遜也指出：“他（指馬士曼——引者注）的第一部中文書《馬可福音書》（指《此嘉音由呀嘞所著》——引者注）^⑥不堪卒讀，然後藉着我抄寄給他的大英博物院稿本和我印的《使徒行傳》之助，他後來出版的《約翰福音書》（即《若翰所書之福音》——引者注）才大有改進。”^⑦馬士曼對此亦不諱言，1817年1月9日致信浸信傳教會：

我們從這些〔白日昇的譯本〕所得到的好處，是在於能夠將我們的譯文與之比較，而不是縮短我們的工作；不過，我們極重視它的價值，並且從中得到充分的幫助。此外還可以補充一句，當我們印刷新約的書信時，一位朋友贈送了一部馬禮遜弟兄印行的版本給我們；而且每當需要之際，我們也認為有責任查閱它；當我們看到它顯然是正確的時候，我們並不認為拒絕任何修改是合理的。在翻譯聖經如此重要的工作中，倘若那些參與工作的人，因着虛榮和愚蠢

① 意大利學者卡薩奇（Giorgio Casacchia）、范麗達（Marianosaria Gianninoto）認為二人於1806年即將《新約》譯成中文，應誤。見（意）卡薩奇（Giorgio Casacchia）、（意）范麗達（Marianosaria Gianninoto）著：《漢語流傳歐洲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11年，頁71。

② 馬敏：〈馬希曼、拉沙與早期的《聖經》中譯〉，《歷史研究》（北京），第4期（1998），頁48；唐子明：《啟示與文字：中文聖經翻譯的故事（1807—1919）》，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18年，頁27。然而，也有學者認為《馬可福音》亦是在1810年刊行，見（德）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著，蔡錦圖譯：《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2年，頁37。

③ 馬敏：〈馬希曼、拉沙與早期的《聖經》中譯〉，《歷史研究》（北京），第4期（1998），頁48。

④ 該譯本為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白日昇（也譯作“巴設”，Jean Basset, 1662—1707）和中國教徒徐若翰（Jean Su）合譯，因此稱“巴設譯本”或“白徐譯本”。1737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英籍職員何治森（John Hodgson, 1672—1755）在廣州發現這一譯本，找人謄抄一份後帶回英國，呈獻給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長漢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 1660—1753）。1739年9月，漢斯·斯隆爵士將這份謄抄本連同收藏的其他手稿一併捐給大英博物館收藏，後世稱之為“斯隆抄本”（Sloane Ms.3599）。馬禮遜來華前，在其中文老師容三德（Yong Sam-Tak）的協助下，謄抄一份帶來中國，成為其翻譯《新約》的藍本。1809年，馬禮遜讓中國助手蔡軒（Tsae Heen 或 Low Heen）抄錄一份《四史攸編耶穌基利斯督福音之會編》，寄送給塞蘭坡（蘇精作“雪蘭坡”）的馬士曼（蘇精作“馬煦曼”）。參見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學生書局，2000年，頁22、150。

⑤ 馬敏：〈馬希曼、拉沙與早期的《聖經》中譯〉，《歷史研究》（北京），第4期（1998），頁52。

⑥ 馬禮遜此處說法有誤，馬士曼出版的第一本中文書實為《此嘉語由呀咻所著》（《馬太福音》）。

⑦ “Morrison to Unidentified Person, Macao, 5 July 1815”，轉引自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學生書局，2000年，頁141。

地自以為可以重現原文的想法，而拒絕參考其他人所作的努力，一切修改都必然是令人失望的事，並且放棄每一個堅持完美無瑕地翻譯聖經的盼望。這樣的參考材料理當樂意地認可採納，為此，我不厭其煩地向你們講述事件的細節詳情。而且我可以補充說，當印刷希伯來書和隨後的書卷時，我滿意地參考了馬禮遜弟兄已經印行的譯本；我們也不認為犧牲準確性是對的，至於兩部譯本擁有的概念差別極大：那些精通中文的人會發現在這部分中，差別之大可能正如我們彼此都衷心關注純正地呈現神的話語一般；但是對於聖經人名和地名統一的重要性，導致我們採納同樣的漢字翻譯它們，則幾乎沒有任何差異。在數年前印行的福音書和最近期的五經書卷中，我們當然沒有前人的幫助可供使用。^①可見，馬士曼和拉薩爾 1813 年以後的《聖經》翻譯，不僅以《四史攸編耶穌基利斯督福音之會編》抄本為參照，對馬禮遜譯本的“可用之處”亦予以採納，也因此導致馬禮遜譯本和馬士曼譯本存在諸多相似之處，從而產生馬士曼抄襲馬禮遜之誤說。^②

馬士曼和拉薩爾參照《四史攸編耶穌基利斯督福音之會編》抄本和部分馬禮遜譯本，翻譯《舊約》，同時修訂《新約》，並接踵提交塞蘭坡浸信傳教會印刷所出版。各部分具體出版年代如下：

- 1816 年——《創世紀》（《神造萬物書》）
 《馬太福音》（《馬竇傳福音書》）
 《馬可福音》（《馬耳傳福音書》）
 《約翰福音》（《若翰傳福音之書》）
 《羅馬書》（《使徒保羅與羅馬輩書》）至《啟示錄》（《使徒若翰顯示之書》）
- 1817 年——《律法書》（《摩西復士律書》）
- 1818 年——《約伯記》（《若百書》）至《雅歌》（《所羅門之詩歌》）
- 1819 年——《以賽亞書》（《先知以賽亞之書》）至《瑪拉基書》（《先知者馬拉記之書》）
- 1821 年（1822）——《約書亞記》（《若書亞之書》）至《以斯帖記》（《依士得耳之書》）
- 1822 年——《新約》^③

^① 轉引自（德）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著，蔡錦圖譯：《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2 年，頁 40。

^② 相關研究請參：馬敏：〈馬希曼、拉沙與早期的《聖經》中譯〉，《歷史研究》（北京），第 4 期（1998）；譚樹林：〈《聖經》“二馬譯本”關係辨析〉，《世界宗教研究》（北京），第 1 期（2000）；趙曉陽：〈二馬聖經譯本與白日昇聖經譯本關係考辨〉，《近代史研究》（北京），第 4 期（2009），等等。

^③ 括弧內為馬士曼譯本題名。

1822年，首部《聖經》中文全譯本在塞蘭坡出版，兩種版本：一是中式線裝5冊本，其中《舊約全書》4冊，《新約全書》1冊；另一種係西式硬封面裝訂，為2卷本，《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各1卷。^①1823年，馬禮遜和米憐合譯的《聖經》中文全譯本以《神天聖書》題名在麻六甲出版，比馬士曼譯本面世遲了一年。

1807年始，馬士曼譯本歷時15年譯成，拉薩爾全程參與，^②因此該譯本被稱為“馬士曼／拉薩爾譯本”。“布坎南牧師以每月300盧比的工資支持拉薩爾15年”這一信息可知，^③拉薩爾完成譯經工作後即遭解聘，此後關於他的行跡沒有留下任何記載。1835年10月的《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報導拉薩爾去世的消息：“我們想，我們曾經在某處看到過拉薩爾先生去世的訃聞；然而，我們已記不清是在哪裏和在何時發生的。”^④據此可以推斷，拉薩爾應該卒於1835年10月之前，準確時間和去世地點不詳。

馬士曼譯本作為第一部《聖經》中文全譯本，其不足顯而易見，其子約翰認為：“這部譯本必然有很多瑕疵，事實上，鑑於它翻譯時所處的極度不利條件，它不可能避免這些缺點，而它現在的價值，主要是作為他的傳教熱誠和在文字工作上堅持不懈的紀念……在多年以後的今天，公平地回顧當時的情況和塞蘭坡差會的期望，對於馬士曼先生的精力用在一項被懷疑是否適宜的模糊目標之上，不能沒有幾分遺憾的感覺。”^⑤馬士曼譯本在中國境內流傳不廣，影響力難以媲美馬禮遜譯本。有論者指出：“在它出現一年內就被取代，只是作為一件精美的印刷品保留在塞蘭坡圖書館的書架上。”^⑥此說有武斷之嫌。首先，馬士曼譯本在南洋流傳頗廣，尤其在華人信徒中受到普遍歡迎；其次，馬士曼譯本對後來浸信傳教會一派的聖經中譯產生重要影響：英國浸信傳教會傳教士胡德邁（Thomas Hall Hudson，1800—1876）的“胡德邁譯本”（Hudson's Version，1866）以及美國浸信傳教會傳教士憐為仁（也作“憐為仁”，William Dean，1807—1895）的“憐為仁譯本”（Dean's Version，1867）、高德（Josiah Goddard，1813—1854）的“高德譯本”（Goddard's Version，1868），均以馬士曼譯本為底本。

① 馬敏：〈馬希曼、拉沙與早期的《聖經》中譯〉，《歷史研究》（北京），第4期（1998），頁49，注釋6。馬立安·高利克則稱該譯本為線裝4卷本，見〔斯洛伐克〕馬立安·高利克（Marián Gálik）著，南宮梅芳譯：〈聖經中文譯本（1818—2004）中的書拉密女形象〉，梁工、程小娟主編：《聖經文學研究》第11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頁97。

② Marshman, John Clark. *The Life and Times of Carey, Marshman, and Ward. Emb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 Vol. 1,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1859, p. 244.

③ Jeyaraj, Daniel. “Embodying Memories: Early Bible Translations in Tranquebar and Serampore.”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 Research*, vol. 40, no. 1, 2016, p. 53.

④ Bridgman, Elijah Coleman.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no. 6, Oct 1835, p. 252.

⑤ Marshman, John Clark. *The Life and Times of Carey, Marshman, and Ward. Emb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rampore Mission*. Vol. 1,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1859, pp. 244-245. 中譯文參考（德）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著，蔡錦圖譯：《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2年，頁37，注釋121。

⑥ Neill, Stephen.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India, 1707-185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96.

因此，馬禮遜譯本和馬士曼譯本在漫長的《聖經》翻譯史上各有特色並扮演着拓荒者角色。拉薩爾作為馬士曼的中文老師^①和譯本的合作譯者，全程參與馬士曼的《聖經》中譯，而且從譯經過程看，拉薩爾不啻為主導者。^②總之，作為馬士曼譯本的合譯者，拉薩爾是《聖經》漢譯史上無法繞開的人物。

[責任編輯 陳超敏]

[校對 李志峰]

^① 據日人吉川雅之 (Masayuki Yoshikawa) 研究，馬士曼《孔子的著作》 (*The Works of Confucius; 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 with a Translation*) 和《漢字與漢語發音專論》 (*Dissertation on the Characters and Soun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兩書中所記錄之粵語音，也是馬士曼從拉薩爾那裏習得。見 Yoshikawa, Masayuki (吉川雅之). “The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 of Cantonese in Two Books by Joshua Marshman: The Macao Dialect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馬士曼所記錄之粵語音——十八世紀末的澳門方言》).”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42, no. 2, 2014, pp. 431-460.

^② 唐子明甚至認為鑑於拉薩爾在譯經中的作用，這個譯本應被稱為“拉撒 / 馬殊曼譯本”，唐子明：《啟示與文字：中文聖經翻譯的故事 (1807 - 1919)》，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18 年，頁 43，注釋 42。